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史》《漢》論贊比較研究（附歷代名家史漢比較資料輯要）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51-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李偉泰

計畫參與人員：陳啟仁,林佳靖,林雅琪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0 月 30 日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史》《漢》論贊比較研究（附歷代名家史漢比較資料輯要）

計畫編號：NSC 91-2411-H-002-051

執行期限：91年8月1日至92年7月31日

主持人：李偉泰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一、中英文摘要

關鍵詞：1. 史記 2. 漢書 3. 論贊 4. 司馬遷 5. 班固

#### 《史漢論贊比較研究》(摘要)

李偉泰

司馬遷和班固的史觀和思想，相當集中的表現於《史記》、《漢書》各篇的論贊之中，因此以兩書記事重疊部分的論贊比較為主，以其他論贊的分析為輔，是把握雙方史觀和思想的要領，同時也是前人所不曾全面從事，而為本研究所專注的工作。其次，前人比較馬、班的不同，絕大多數將其注意力集中於孰優孰劣的問題，本研究則將注意雙方議論雖然不同，然而各具匠心，提出同樣值得後人重視的見解，甚至都是至理名言的情形，為馬、班思想和漢代歷史的研究提供另一種視角。

Keywords: 1. *Shichi* 2. *Hanshu* 3. Comments on history 4. Ssu Ma-chien  
5. Ban Ku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hichi* and *Hanshu* about Comments on History

Lee Wei Tai

The authors' thoughts of *Shichi* and *Hanshu* are intensively concentrated on the parts of comments on history. If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s are described in both books, we can compare the contents and comments to show each author's difference. This kind of comparative studies will be more precise than the impressive description style in the past.

Furthermore, instead of the earlier comparison between two authors usually put more emphasis on who is the better on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mphasize each author's important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idea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Thus, it can offer a new research point of view as a reference to the thoughts of Ssu Ma-chien and Ban Ku, and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 二、前言

本計畫所稱《史記》論贊，包括四個部分：一、全書卷末〈太史公自序〉後半為各篇所寫的序，通常習稱之為〈自序〉。二、篇前冠以「太史公曰」的議論，稱之為「序」。三、篇末冠以「太史公曰」的評論，稱之為「贊」。四、包含大量議論的「論傳」，如〈伯夷列傳〉、〈太史公自序〉前半均是。《漢書》論贊，包括三個部分：一、全書卷末〈敘傳〉為各篇所寫的序，仍稱之為〈敘傳〉。二、篇前議論，稱之為「序」。三、篇末評論，稱之為「贊」。

本計畫就《史》、《漢》記事重複，而論贊的議論卻有所不同的地方，逐一做細部的比較。至於彼此行文時遣詞用字的差異，除非涉及褒貶，一來由於前人著墨已多；二來由於不是馬、班著述的重點，所以不再重複作文詞異同的比較。此外，自班彪、班固父子說《史記》十篇有錄無書，魏·張晏列舉這十篇的名目是：〈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宋代以來有人不盡信從，近人余嘉錫特地為此撰寫〈太史公書亡篇考〉，全文約六萬字，證明「十篇有錄無書說」確當無疑（此文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月，頁1-108。），所以凡涉及這些篇的《史》、《漢》論贊，也不在比較之列。

## 三、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綜述

西漢二百年歷史，《史》、《漢》兩書所記重疊部分超過一百年；《漢書》一百篇，有五十五篇與《史記》內容重疊，無怪乎從東漢初年的王充開始，就已從事《史》、《漢》比較的工作（見《論衡·超奇篇》）。從王充到目前，《史》、《漢》比較的主要內容有下列四個部分：

1. 文字異同：兩書對照，分析班固如何增省《史記》的文字。宋·倪思著，劉辰翁評《史漢異同評》，明·許相卿著《史漢方駕》，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漢書增事蹟〉、〈漢書移置史記文〉等條目，均為其中著名的代表作。

2. 體例異同：《史》、《漢》均為紀傳體，這是同；《史記》為通史，《漢書》為斷代史，這是異。歷代學者尊通史者則揚馬抑班，南宋鄭樵為其中的代表人物；尊斷代史者則揚班抑馬，唐代劉知幾為其中的代表人物。清·章學誠認為「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皆為紀傳之祖也。」（《文史通義·書教下》）對《史》、《漢》均加以肯定，實為通達之論。

3. 風格異同：評論馬、班文章風格的不同及其優劣，自劉宋范曄、宋代程頤、朱熹、黃履翁、明代凌約言、茅坤、清代曾國藩、牛運震，今人施丁等，代不乏

人。比較集中的資料見於明代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日本有井範本補標《史記評林》、明代凌稚隆編《漢書評林》。《史記》是文史不分的典型代表作，《漢書》則朝文史分流邁開了一大步，就歷史散文來說，《漢書》略遜於《史記》。雖然歷史家注意的重點不在文章，但無可否認，歷代均有不少文人從文章優劣的角度來研究《史》、《漢》，正如他們用同樣的角度來研究《莊子》和《孟子》等思想性著作一樣。

4. 史識和思想異同：西晉傅玄已經從史識和思想的角度評論馬優而班劣（見嚴可均輯《全晉文·傅子補遺上》），清代研究《史》、《漢》異同而有專書的有楊于果《史漢箋論》、楊琪光《史漢求是》。有專題論評的有蔣中和、徐乾學、沈德潛、浦起龍、朱仕琇、邱逢年、熊士鵬、汪之昌等人。間接論及的有錢謙益、顧炎武、全祖望、牛運震、王鳴盛、趙翼、章學誠、陸繼輅、王筠、沈家本等人。近人有梁啟超、劉咸炘、呂思勉、朱自清、鄭鶴聲等，今人有白壽彝、施丁、徐朔方等。上列各人，無論偏向司馬遷或班固，或多或少都能注意到從史識和思想的不同處去辨識《史》、《漢》的差異，所以其見解遠較前人深刻。

司馬遷和班固的史觀和思想，相當集中的表現於《史記》和《漢書》各篇的論贊，所以如果要比較馬、班的史識和思想，以記事重疊的部分論贊比較為主，以其他論贊的分析為輔，應該是把握雙方史觀和思想的要領，同時也是前人所不曾全面從事，而為本計畫所展開的重點研究工作。

#### 四、結果與討論

《史》、《漢》記事重複，而論贊的議論卻不盡相同的地方，要而言之，約有以下數點值得特別提出來討論：

1. 對於漢朝沿用秦制的作法，馬、班都不滿意，但批評的方式不同。《史記·高祖本紀贊》說：

周、秦之間，可謂文蔽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此處司馬遷採取「指桑罵槐」的方式，表面上批評秦朝的酷刑政治，讚揚漢初比較寬鬆的治術（〈平準書〉說：「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實際上話鋒不免波及「法嚴令具」（〈平準書〉語）的漢武帝。班固曾因被告「私改作國史」下獄，後來受詔完成《漢書》（見《後漢書四〇上·班彪列傳》），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因此下筆較為謹慎，但並不表示沒有批判精神，這方面必須通覽全書才看得出來。例如關於漢代沿用秦制，在官制方面，〈百官公卿表序〉說：

周官則備矣。……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

以周官之「備」與漢沿秦制的「簡易」對比，對漢制的不滿就意在言外了。或以為班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見《漢書評林》引邵氏）殊不知「借古諷今」原是許多人常用的便利手法，班固自然也不例外。在刑法方面，班固特闢〈刑法志〉以說明兩漢刑法制度的沿革，他在檢討兩漢刑獄繁多的現象之後，認為根本原因在於「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此一絕大部分沿用秦律的漢律，其與儒家政治理想相距天遙地

遠的情形，遂明白表露無遺。

2.《史》、《漢》論贊同樣富於作者的身世之感，只是感受的內容不同而已。這種差異出現於相同或相似的列傳時，尤其值得玩味。例如《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贊》說：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這話有司馬遷的身世之感，對照〈伍子胥列傳贊〉：

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弃小義，雪大恥，名重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廉頗藺相如列傳贊〉：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凡此，均與〈報任少卿書〉所說同調：

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班固沒有沿用司馬遷的議論，他在〈魏豹田儋韓王信傳贊〉中說：

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本篇贊語顯示他重視世業的綿延持續，歎息世家的難於保全。這種想法，也見之於卷六十〈杜周傳贊〉、卷六八〈霍光傳贊〉、卷七九〈馮奉世傳〉、卷五九〈張湯傳〉及〈贊〉等。就其自身來說，則明白見之於〈幽通賦〉中的陳述：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見〈敘傳〉上）

為了世業的綿延，理所當然的，班固關心全身保生之道，他在〈司馬遷傳贊〉說：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就在感歎以司馬遷的博聞多知，卻不能全身遠害。

又如《史記·鄒陽列傳》只錄其〈獄中上梁王書〉，贊語以其「詞雖不遜」、「抗直不撓」與魯仲連之「不詘於諸侯，談說當世，折卿相之權」，亦即不向權勢低頭為其共同點之一。其次則以鄒陽為人所毀謗，主上不悟，使其身陷囹圄，與史公遭遇有相似處，故云「有足悲者」，並因此而將鄒陽上書收錄，所以此中有史公的身世之痛的因素。《漢書·鄒陽傳》並載其〈諫吳王書〉，贊語說：「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危國」指吳國，「言正」指鄒陽、枚乘之〈諫吳王書〉。馬、班身世遭遇不同，所以對鄒陽的評論也完全不同。前者灌注了自身的感情，後者關心的是士人處在危局中，既盡言責，且能全身而退的道理，二者同樣帶有史家的身世之感。

3.某些《史》、《漢》論贊之所以不同，可以從時代背景的差異來解釋。例如對於經濟活動的態度，司馬遷生當漢武帝大事干預經濟活動的時候，自然容易

傾向主張自由放任，所以他在〈貨殖列傳序〉中說：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在〈平準書〉中記載卜式斥責桑弘羊制定均輸、平準的措施是小商人的行為：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這是司馬遷慣用的「寓論斷于敘事」的手法。班固面對的社會，則是長期存在的貧富不均的現象，權貴及富豪之家不但兼併小民的土地，同時在工、商業方面和民眾作不公平的競爭，所以他一方面在〈食貨志序〉和〈貨殖傳序〉中一再提到管仲的「四民分業定居論」，認為士不宜兼營他業，士應該「相與言仁誼於閒宴」，「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另一方面，他主張政府介入調節財富，以避免貧富懸殊的現象。在〈食貨志〉本文中，於敘述井田制度時，插入「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這其實是班固的新說，而為前此孟子等各家所不曾提及。其目的在為限田論提供經典上的依據，也很清楚。他在〈食貨志贊〉中說：

《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總而言之，司馬遷相信經濟活動有其客觀規律，政府最好聽其自然發展；班固則指出適度調節的必要性。雙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鏡。

又如關於佞幸，漢朝佞幸之害，以哀帝時最為嚴重，為司馬遷所不及見，所以馬、班對於佞幸的評論有較大的不同。《史記·佞幸列傳自序》說佞幸「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指出佞幸能獲親近，在材能上也是各有所長，例如韓嫣「善騎射，善佞。」李延年「善歌」，善於作曲。顯示司馬遷對於佞幸並不完全否定，還是承認他們是有一些材能的。序文說：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一個人的感情、事業是否如意，不是完全能由個人的條件來決定；能否遇到一個賞識你的對象或上司，往往才是決定性的因素。而這種「遇合」的形成，多半由於偶然性的機緣。這一則諺語充分反映了人們對這種情況的無奈與感歎。而這種無奈與感歎，獲得了司馬遷的強烈共鳴。贊語說：

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彌子瑕，衛靈公寵臣。得寵之時，一切作為均受到靈公的贊賞；失寵之後，同一事件都成了罪狀。事詳《韓非子·說難》、《史記·韓非列傳》、《說苑·雜言》。），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情隨事遷，愛憎異時，當然不只是衛靈公對彌子瑕一個人而已，也不只是佞幸的宿命而已，同時也是任何時代謀求富貴者的宿命。孟子說：「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見《孟子·告子上》。）司馬遷所敘述的具體歷史事件，等於是對這句話作了生動的詮釋。

班固對於佞幸的評價，則是純從負面作嚴厲的批判。〈敘傳〉說：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

贊語說：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哀、平之際，國多釁矣。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班固有鑑於哀帝過分寵愛董賢，紛亂朝綱，所以有上述嚴厲的批評，以垂誡於後世。至於說：「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則反映了班固對禍福之道一貫關心的態度。

總之，漢朝佞幸之害，以哀帝時最為嚴重，為司馬遷所不及見，所以他還能肯定佞幸之所以能獲得親近君主的機會，他們在材能上也是各有長處的。並且藉此為卑微的人物抒發感歎：他們要往上爬，成功的因素不完全操在本人身上，往往取決於偶然性的機緣；而且即使一時受到了君主的寵幸，也難保能夠善始善終。而這些，可以說就是卑微人物的宿命了！班固既然看到了哀帝寵幸男色的禍害，為了垂誡於後代，所以焦點集中於批判佞幸之害，無暇再借題另作發揮了。

## 五、參考文獻

參見第三項。

## 六、計畫成果自評

馬、班優劣的爭議，由於擁馬與擁班雙方史觀與文學觀不同，始終難於取得共識，本計畫在各篇的細節比較時，雖然不能完全避開這個問題，但也深刻體認到，作為經典性著作的「基礎研究」，盡可能找出馬、班議論「異曲同工」之處，以供學者「兼採並用」、或「擇一採用」的依據，使馬、班兩大史學家的工作成果能盡量為後人所利用，是本人所期望能夠達成的工作目標。這項工作，如今終於有了初步的成果，接下來將分項整理成文，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以便眾多的學者能分享本計畫的成果。

本研究計畫與本人所開設之「史記研究」、「漢書研究」課程密切相關，所以也頗能得到教研相長的樂趣。附錄《歷代名家史漢比較資料輯要》，是本研究的副產品，將在稍後與書局洽商出版。